



■编者按:在南京雨花台功德园的红星园里,长眠着唐亮、杜平、饶子健、刘飞、刘先胜、聂凤智等百余位开国将军和老红军。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,都堪称一部壮丽的史诗,其中的篇章,既有战争年代的叱咤风云,也有和平年代的柔情大爱。《发现》周刊联合《铁军》杂志、雨花台功德园共同推出“红星园·将星闪耀”系列,一为您介绍将军们的传奇故事。

Discovery Weekly



杨汉林(1915年-1985年):江西省兴国县东村乡人,少将。曾任红二十二军政治部组织干事,红二十三军直属队党总支书记,独立第十六团总支书记。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“围剿”斗争。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时,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,后任湘粤赣边区游击支队第一大队政治委员,中共资(兴)汝(城)桂(东)边区区委书记、县委书记、组织部部长。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荣获八一勋章、独立自由勋章、解放勋章。1985年2月9日病逝。

将记忆定格在战争中的杨汉林将军

“我从事老干部工作多年,总是想法设法地帮他们出文集、回忆录,记录下关于战争年代的宝贵记忆。对自己的父亲,却感到很内疚,我一直没有很好地收集、整理关于他的资料。父亲离开我已经26年了,那些珍贵的‘口述历史’我再也不听到了。”说起父亲,杨晓东唏嘘不已。

□本版主笔 见习记者 唐蕾

战斗中积累经验 “文将军”火眼金睛辨同志

“父亲是江西兴国人,那可是全国赫赫有名的‘将军县’啊!光开国将军就有50多位,父亲是其中之一。”说起父亲杨汉林,杨晓东沉浸在一种光荣的情绪中。

杨汉林从小家境贫寒,有一个哥哥、两个姐姐,年龄最小的他是个遗腹子。因为家境太困难了,母亲把他过继给了舅舅和两位族叔,可以说是吃四家饭长大的。舅舅是位私塾先生,在他那儿杨汉林读了3年书。也正是那几年的私塾功底,让杨汉林成为战友中的“小知识分子”,一辈子都从事思想政治工作,是个不折不扣的“文将军”。不久舅舅去世,家里没有余钱供他继续读书,12岁的杨汉林就去给地主放牛,直到15岁参加红军。

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时,根据上级的命令,杨汉林被留在中央苏区进行艰苦的游击斗争,经过同志们的一致推选,杨汉林成为湘粤赣游击支队第一大队的政治委员,同时任中共湘南资(兴)汝(城)桂(东)边区县委书记。1936年

率部队来到了湘南的八面山。

苏区的工作和生活是很艰难的,和上级机关又始终联系不上。一天,桃寮村的一位群众向杨汉林报告,说村里来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,到处打听红军消息,大家觉得他心怀不轨就抓了来。这个人一来就自我介绍,自己原先在一方面军工作,因为与湘黔边境的一支部队断了联系,上级派他来寻找。杨汉林和战士们觉得不能掉以轻心,决定观察一阵。

相处了一段时间后,这个人和战士们打成一片,大家对他的疑虑渐渐打消。不久,一个新的疑问又出现了。一天雨夜行军后,大家都忙着晒衣服,只有这个人始终穿着湿衣服不肯脱。这个细节引起了杨汉林的重视。

后来,经过一番详细的询问才发现,原来在这个人衣服的衬里藏着电报密码,他是上级派来给湘黔边境的部队送新密码本的。这时高度警觉的杨汉林才松了口气,后来,他在《八面山上的黎明》中记录了这件事。

皖南事变突围中 他接到了项英遇难的噩耗



项英被叛徒杀害之地——蜜蜂洞资料图片

在杨晓东的记忆中,父亲杨汉林对安徽泾县有着特殊的感情,每每说到皖南事变,都痛心疾首。他常常说起当年副军长项英的惨死。

1941年1月14日,军长叶挺为挽救危局,下山和国民党军队谈判,身陷图圈。副军长项英在辗转很久后,终于联系上了当时任军部政治处主任的杨汉林和其他一些战士。为了加强管理,项英任命杨汉林为党总支书记,让他在工作中消除战士们不安、急躁的情绪,坚定革命信心,并带领大家寻找藏身之所,等时机一成熟,就想办法突围。

当时项英就和新四军的副参谋长周子昆、周的警卫员黄诚以及刘厚总,一起住在一个叫“蜜蜂洞”的小山洞里。这个刘厚总是新四军特务营的副营长,在突围中一路嘘寒问暖,

赢得了项英的信任。可是这个人过去就有种种不良表现,杨汉林当即对项英提出,要提防刘厚总,并表示自己亲自保护项英。项英认为杨汉林还要带部队太辛苦了,就没答应。

眼见一次次突围不成,刘厚总完全丧失了革命意志和决心,就想杀害项英后,向国民党邀功请赏。一天深夜,趁大家都在熟睡,刘厚总枪杀了项英和周子昆,打伤了黄诚,偷走了他们的武器和随身携带的军费,去向国民党投降。路上遇见了同志,刘厚总说自己是要去水岭找杨汉林联系突围的事,这正是前一天项英交代的任务。第二天杨汉林并没有等来商量突围事宜的同志,相反,等来的却是项英被叛徒枪杀的噩耗。

每次想到这段日子,杨汉林总是止不住的悲痛。



上世纪60年代杨汉林去舟山群岛视察的照片。走在最前面的就是杨汉林,时任视察团团长



杨汉林(右一)视察部队



杨汉林夫妇与孩子们的全家福



杨汉林(右一)陪同叶帅(左三)视察

母亲珍藏着一块有周恩来手迹的白绸布

“父亲对泾县有感情,还因为母亲焦恭真老家也是泾县的。”

在杨晓东的印象中,父亲沉默寡言,对孩子要求严格,“母亲比较溺爱我们,每次调皮被父亲拧耳朵、罚站墙角,都是母亲去解救我们。”

“当时,革命队伍中女性很少,新四军规定军官结婚必须符合‘二五八团’的标准:年龄25周岁以上,党龄8年以上,职务在团职以上。父亲遇见母亲时已经达到了标准,两个人就结合了,幸福地过了一辈子。”

同样是老革命的焦恭真,原来和周恩来还有过一段故事。

焦恭真出生在殷实的商人家庭,接受了良好的教育。中学时走上革命道路,积极参加抗日宣传与募捐活动。后来,去了战地服务团工作。

1939年,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等来到云岭,战地服务团举行欢迎演出。活泼开朗的焦恭真唱歌、跳舞、演戏,还兼任剧务。演出很成功,演出结束后周恩来等接见全体演职人员,大家都很高兴。

这时焦恭真灵机一动,扯了一块白绸布,请周恩来签名留念。周恩来爽快地答应了,要求带回住处,请大家来签名。又关心地叫她叫什么名字。焦恭真回答了,总理沉吟了一会,就说改成焦恭真吧,寻求真理的“真”(原名为焦恭贞)。焦恭真开心地答应了。后来果然有12名领导在绸布上签名留念。如今这块珍藏了70年的珍贵绸布,已经由焦恭真赠送给了南京军区军史馆,让更多的人去参观、铭记那段历史。

自己的孩子没有任何特权,对战友的孩子奋力保护

“我们家一共弟兄6个,全是儿子。其实父母一共生了10个孩子,前面4个都是在最艰苦的战争年代就夭折了。母亲时常提到曾经有过一对双胞胎姐妹,战争期间得传染病死了。每次说到都很伤心,那时环境确实太艰苦了。我现在的大哥可以说是警卫员带大的。父母工作太忙,根本没时间带孩子。”

杨晓东说因为父亲生病,平日家里很安静,但是每当战友们的来了,就成了最热闹的时刻。父亲平时很严厉的脸变得温和起来,也

只有这时,孩子们才敢“人来疯”,兴致勃勃地听大人们一遍遍地说革命战争往事。

虽然出生在高干家庭,但从小没享受到什么特权,“小时候,父亲是不给我们坐他的专车的,生病了也都自己去医院排队挂号,和普通人家没有区别。三年自然灾害时一样吃不饱肚子,父亲那时还有点黄豆之类的食物上的补助,我们平时在家都是吃黑窝窝头。读书也都是就近读的山西路小学,没进高干小学。父亲从来就没有让我们享受特权的

想法。”

“我记得那时父亲每个月有300块的工资,但是经常会资助一些老家的乡亲;父亲过去战斗过的地方来的客人,也一定会好好招待。有些多出来的布票、粮票也都送给他们了。文革时候,父亲很多老首长、老部下被打倒了,他们的孩子也受到牵连。父亲就到处打电话拜托,母亲也亲自去找人,想方设法送那些孩子去参军。父亲虽然看似严厉,但是有一颗温暖、善良的心。”

父亲的记忆定格在泾县,从未离开

“父亲战争时负伤,留下了后遗症,加上常年工作太劳累,身体不好,1964年就离开工作岗位了。”

也是因为较早离职,文革期间,杨汉林过得相对平静。在家他仍然关心政治,喜欢听听收音机,了解国家动态。

“1969年底,南京军区有内部征兵。我刚满16岁,就向父母提出要当兵。当时招兵的单位也多,有的就在南京,离家也近。当父亲知道有泾县的部队来招兵,立即决定让我

去那当兵。并拿出地图指给我看,‘当年新四军军部在云岭,皖南事变发生在茂林,我和你妈妈经历了皖南事变,都突围出来了,但是大部分战友都牺牲或者被捕了……’”

“以后每次我从泾县回家探亲,父母都特别高兴,话匣子全打开了,总要说起突围的那些日子。问长问短,他们对那里的感情太深厚了。”

是因为皖南事变之后,大家都等到天黑后才敢突围。精神压力太大了,晚上行军又困倦,就抽烟提神,没想到就上了瘾,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老。我每次回来就投二老所好,买点烟孝顺他们。”

“我记得有一次从泾县回来探亲时,买了当地名茶——甬溪火清带给父亲,因为是从泾县带回来的,父亲特别高兴,喝着茶,又一遍讲起了当年的战争,那里的百姓,好像他一直在那,从未离开……”